

理学官方化视域下的宋季散文创作

邓莹辉 韩黛安

(三峡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 宜昌 443002)

摘要:宋季散文是两宋散文发展过程中重要的一环,学界虽然对其评价一直不高,甚至认为文至南宋无一足观者,然而此一阶段的散文也自有其特点和价值,尤其是道学家的散文,不仅内涵丰富,且风格多样,具有较为明确的时代特征。其讲学文、题跋文、记体文和奏疏文以阐述道德义理为中心,呈现出明显的道学色彩,是理学官学化在文学领域的反映。透过宋季理学散文,能够了解政治和学术权力是如何影响和规范文学的历史进程和发展方向的。

关键词:理学;散文;宋季;文以载道;文风平实

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0)03-0084-06

在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宋代散文绝对称得上是一个鼎盛时期,这是许多治文体学专家所普遍认同的一个总结性论断。金代文学批评家王若虚就曾经这样说过:“扬雄之经,宋祁之史,江西诸子之诗,皆斯文之蠹也;散文至宋人始是真文字,诗则反是矣。”^[1](P465)]之所以如此断言,是因为宋代散文不仅以其作品数量的繁盛、大家名作的辈出、文学流派的纷呈、艺术风格的多样以及文体类别的齐备而被许多评论家称为我国古代散文发展历程中的“巅峰阶段”^[2](P48)],而且学界对这种观点几乎不存在任何异议。

一、关于宋季散文的总体评价

但这种肯定几乎都是针对北宋散文而言的,尤其是以“唐宋八大家”而著名的欧阳修、王安石、三苏和曾巩都是北宋元祐时期的散文大家,其光芒完全掩盖了宋代其他时期和其他作家的创作成就。相比之下,无论是当世学者还是后世批评家,对南宋散文尤其是宋季之文,不仅关注度低,而且即便有所评论,也多是抱持否定的态度。如陆游就批评孝宗乾、淳年间文人散文“或以纤巧摘裂为文,或以卑陋俚俗为诗,后生或为之变而不自知”^[3](P356)],宋末著名学者罗大经在其《鹤林玉露》中也有这样的批评:“文章

性理,须要胸中有万卷书为之根底,自然雄浑有筋骨,精明有气魄,深醇有意味,可以追古作者。……王荆公谓今之作文者,如拾奇花之英,掬而玩之,虽芳馨可爱,而根底蔑如矣。虽然,岂独文哉!近时讲性理者,亦几于舍六经而观语录。甚者将程、朱语录而编之若策括策套,此其于吾身心不知果何益乎!……余尝辑《心学经传》十卷,序发之辞有曰‘学者不求之周、程、张、朱固不可,徒求之周、程、张、朱,而不本之六经,是舍祢而宗兄也。不求之六经固不可,徒求之六经,而不反之吾心,是买椟而弃珠也’。”^[4](P332~333)]他对晚宋性理之文舍六经而“徒求之周、程、张、朱”所导致的危害性一针见血地提出批评,并指明散文写作正确的方式:本之六经。元人袁桷对此现象也有相似的看法:“江西诸贤别为宗派,窃取《国策》《庄子》之词杂进,语未毕而更,事遽起而辍,断续钩棘,小者一二言,长者数十言,迎之莫能以窥其涯,而荒唐变幻,虎豹疏而鱼龙杂也”^[5];“后宋百五十年,理学兴而文艺坏”^[6]。《四库全书总目》则评价说:“文章至南宋之后,道学一派侈谈心性……庸沓委琐,古法荡存,理极数穷,无往不复。”^[7](P1440)]就连宋末以名节著称于世的作家刘辰翁的散文也受到四库馆臣们的批评,认为其“文章亦见重于世。其门生王梦应作祭文,至称韩、欧后惟先生卓然秦汉巨

收稿日期:2019-12-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理学官方化与宋季诗文嬗变之关系研究”(15BZW097)

第一作者简介:邓莹辉(1964—),男,湖北巴东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宋元文学研究。

笔。然辰翁论诗评文,往往意取尖新,太伤佻巧。……即其所作诗文,专以奇怪磊落为宗。务在艰涩其词,甚或至于不可句读,尤不免轶于绳墨之外”^{[8](P1409)}。而在古人的批评中,明人对南宋散文的否定最为决绝:“南宋之诗,犹有可取。文至南宋,则尖新浅露,无一足观者矣。”^[9]称其“无一足观者”,显然不是理性判断。

从宋季散文的创作实践看,道学家的散文应该居于主导和主体地位。道学家之文,虽然始终坚持平易畅达的文风,但其重道轻文、专务讲学的缺陷较之前期更加突出,其所作多质木无文,缺乏文采,甚而至于流为讲义、语录之体。因此,相比一般文人,道学家的散文创作所受恶谥尤甚,就连最著名的理学古文大家朱熹一派亦惨遭抨击,《庆元党禁》形容朱熹一派之文为“对偶偏枯,亦如道家之科仪;语言险怪,亦如释氏之语录”,指出其文质实而不事雕琢、用语俚俗而无所润泽的弊病。宋末元初学者周密在论及南宋散文之变迁时,以太学之文为例总结道:“南渡以来,太学文体之变,乾淳之文师淳厚,时人谓之‘乾淳体’,人材淳古,亦如其文。至端平江万里习《易》,自成一家,文体几于中复。淳祐甲辰,徐霖以书学魁南省,全尚性理,时竞趋之,即可以钓致科第功名,自此非《四书》《东西铭》《太极图》《通书》《语录》,不复道矣。”^[10]理宗淳祐元年(1241)正是理学被定为官学的时间,而淳祐甲辰(1244)徐霖因会试策文多言性理而登高第,其示范作用非同小可,使得宋季文坛侈谈心性成为潮流,被视为宋季文坛上的一股颓波。可见,对南宋尤其是宋季散文持否定态度的明显占据上风。

然而,在一片指责否定的批评声中,也有一些批评者对宋季散文有着较为理性的分析和判断,给予了其相应的地位。如元人虞集曾以一种较为客观的态度论述南宋古文的演变过程:“乾淳之间,东南之文相望而起者,何啻十数。若益公之温雅,近出于庐陵;永嘉诸贤,若季宣之奇博而有得于经;正则之明丽,而不失其正。彼功利之说,驰骋纵横其间者,其锋亦未易婴也。文运随时而中兴,概可见焉。然予窃观之朱子继先圣之绝学,成诸儒之遗言,固不以一艺而成名。而义精理明,德盛仁熟,出诸其口者,无所择而无不当。本治而未修,领挈而裔委,所谓立德立言者,其此之谓乎?学者出乎其后,知所从事而有得焉,则苏、曾二子望欧公而不可见者,岂不安然有拱足之地,超然有造极之时乎?而宋之末年,说理者鄙薄文辞之丧志,而经学、文艺判为专门,士风颓弊

于科举之业,岂无豪杰之出,其能不浸淫汨没于其间,而驰骋凌厉以自表者,已为难得,而宋遂亡矣。”^{[11](P2)}他充分肯定了南宋中期以朱熹等为代表的道学之文,而批评宋季“说理者鄙薄文辞之丧志,而经学、文艺判为专门”,从而导致文道分裂的局面,是有所保留的批评。娄姚椿在为清人庄仲方辑《南宋文范》所作序中指出:“夫以文载道之说,始于韩子,而欧阳子承之,至朱子而其道益光。同时诸贤,莫不质而有文,彬彬乎韩欧之余绪也。”又说:“或曰:南宋文气冗弱,上不能望汉唐北宋,而下亦无以过元明。夫道德之言不专主乎文,而亦未始不有其文。故自韩欧以来,一则曰文者贯道之器,一则曰文与道俱。此虽其才不逮前人,犹将过而存之以学者劝,而况其人与文之光明俊伟若是者乎!”肯定了南宋散文“彬彬乎韩欧之余绪”的历史地位,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宋季散文在内,如魏了翁、真德秀、刘克庄、林景熙等人。而当代一些研究者也认为,作为宋代散文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宋季散文也自有其特点和价值。“南宋后期至宋元之变,虽文坛衰微,仍不乏名家,如魏了翁的雄贍雅健,陈耆卿的雄奇密丽,刘克庄的宏博雅洁,乃至文天样的风骨凌厉,戴表元的清深雅洁,刘辰翁的奇怪磊落,也都别开生面,足以成家。”^{[12](P116)}而理学家的散文也并非只有“侈谈心性”的一面,而是内容丰富,风格多样,具有较为明确的时代特征。如以黄榦、真德秀、魏了翁等为代表的闽学派理学家的散文“言事论政之文的充沛激情与豪健风骨、墓志文的真情流露、题跋文的鲜明个性、记体文的借题发挥手法等,都在创作实践上突破了闽学‘重道轻文’的束缚”^{[13](P4)},而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叶适更堪称宋季散文宗主,其文不仅内容充实,文备众体,而且风格多样,被视为足以追踪北宋欧阳修、苏轼等大家,可与苏洵、苏辙相颉颃的一代散文大家。

谈及南宋尤其是理学官方化背景下的宋季散文,“冗弱”二字成为前人为它贴上的标签。所谓“弱”,主要指宋季散文普遍缺乏气魄,笔力柔弱,气象萎靡,而议论更加趋于精细深微,情感多流于悲凉凄清;所谓“冗”,主要指宋季散文多有拖沓冗长、杂乱散漫之作,不讲究章法,结构不够严谨。这些问题主要存在于碑志、传记、行状等叙述性文体之中,而在讲学类的讲义、语录等文体中表现尤其突出。造成宋季散文这一现状的原因非常复杂,一方面是宋代散文从北宋中期欧阳修、苏轼等倡导的追求平易文风发展到极致,而最终走向它的反面,汗漫相率,

沿袭成风,由盛到衰,这是无法破解的文学发展规律;另一方面,或者更为直接的主要原因在于,南宋后期理学盛行,讲学成风,理学家重道轻文,义理至上,重内容而轻艺术,从而造成文章多率意为之,缺乏精心结撰、精雕细刻,许多文章类似讲义、语录之体。但是,我们也不能以偏概全,以为大势所趋就否定另外一部分作家的成就。“冗弱”固然成为一部分宋季散文的明显缺点,但以之概括整个南宋晚期的散文创作,又显得极端片面,缺乏说服力。

因此,对宋季散文的观照,我们既要看到其“冗弱”的一面,也要肯定其“脱化町畦,独运抒轴”的一面。以下试图以道学家的散文作品为主体,分别从讲学类、序跋类、记体类和笺表奏疏类散文概括探讨宋季散文的主要内容及特点,从而对宋季散文做出简单的描述,以期能够让读者初步了解宋季散文的真实面貌和题材风格的多样化特征。

二、讲学类散文

道学散文被视为宋代散文鼎足而立的重要一极:“唐文章三变,本朝文章亦三变矣。荆公以经术,东坡以议论,程氏以性理,三者各立门户,不相蹈袭。”^[14]宋季吴渊持相似观点,并特别强调道学散文的价值及其影响,同时也指出道学末流之散文的弊端。他在《鹤山集序》中评价说:“艺祖救百王之弊,以道理最大一语开国,以用读书人一念厚苍生,文治彬郁,垂三百年。海内兴起未艾也。而文章亦无虑三变,始以庆五季之萎薶而昆体出,渐归雅醇,犹事织组,则杨、晏为之倡;已而回澜障川,黜雕返朴,崇议论,厉风节,要以关世教、达国体为急,则欧、苏擅其宗;已而濂溪周子出焉,其言重道德,而谓文之能艺焉耳,于是作《通书》,著《极图》,大本立矣。余有所及,虽不多见,味其言藹如也。由是先哲辈出,《易传》探天根,《西铭》见仁体,《通鉴》精纂述,《击壤》豪诗歌,论奏王、朱而讲说吕、范,可谓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矣。后生接响,谓性外无余学,其弊至于志道忘艺,知有语录而无古今,始欲由精达粗,终焉本末俱舛,然则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亦岂周子之所尚哉!……南渡后,惟朱文公学贯理融,训经之外,文膏史馥,骚情雅思,体法毕备。又未几而公与西山真公出焉。……窃惟公天分颖拔,蚤从诸老游,书无不读,而见道卓,守道约,故作为文率深衍闳畅,微一物不推二气五行之所以运,微一事不述三纲九法之所以尊,言已必致知力行,言人必均气同体,神怪必不语,老佛必斥攘,以至一纪述,一咏歌,必劝少讽多,必情

发礼止,千态万变,卒归于正。及究其所以作,则皆尚体要而循法度,浩乎如云浮空而莫可状,凜乎如星寒芒而莫可干,蔚乎如风激波而皆自然,其理到之言欤!其有德之言欤!程、张之问学而发以欧、苏之体法欤!公文视西山理致同,醇丽有体同,而豪赡雅健则其所自得。故近世言文者曰真、魏,要皆见道君子欤!”^{[15](P24~25)}相对陈善的简单明了,吴渊重点论述了道学派散文的发展历程,强调“志于道,游于艺”的重要性,充分肯定了朱熹散文的“文膏史馥,骚情雅思,体法毕备”、真德秀的“理致”“醇丽”以及魏了翁的“豪赡雅健”。这实际上也为宋季散文发展树立了明确的标准,即“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程、张之问学而发以欧、苏之体法”,将学者之文与“圣哲之文”融合,以消解文章家和道学家在文道问题上的紧张关系。

关于南宋特别是宋季散文,学术界有一个基本共识,那就是各种体例的散文成就呈现出高下不均衡的状态,相对而言,议论性散文成就较高,艺术性较强;而记叙性散文特别是碑志文比较散漫萎弱,缺乏北宋此类文章的厚重精密和奔放的气势。而理学家所经常采用的语录讲义体作品,更是提倡无意为文,不讲章法结构,所以这一文体虽然在宋季风行一时,却始终无法在散文中获得合法地位。

宋季随着理学官方地位的取得,其在教育领域、科举场域都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为了将理学影响辐射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道学家们创作了大量讲学之文,在朝廷、太学、州县学、书院等不同场合阐扬道学思想,传递理学观念。所谓讲学之文,顾名思义就是讲论传统道德,阐发儒家义理的文章。从内容上说,讲学之文主要是阐释四书五经的思想以及道学之心性义理、天理人欲等相关范畴。从形式上言,有的是针对帝王的经筵讲义,有的是面对各类学子的教学讲义,而更多的当属道学家对理学相关主题的阐述议论。

经筵讲义最早出现在宋神宗元丰年间,它是学者为了满足统治者通经史而明治道的需求而产生的。南宋孝宗朝,理学进入宫廷经筵,促使经筵讲义蓬勃发展,影响遍及朝野;宁宗庆元时期,随着庆元学案的发生,道学衰微,经筵讲义也走向衰落;理宗亲政,大力提升理学的地位,道学繁荣昌盛,经筵文学的发展也达到高潮,出现了包括真德秀、洪天锡等一批经筵讲义作家。可以说,经筵是道学的产物,它随着道学地位的起落而盛衰。宋季有不少理学家具有为皇帝讲学的经历,留下了相当多的经筵讲义之

文。如《宋史》卷424《洪天锡传》载:“(洪天锡)宝庆二年进士。授广州司法……所著奏议、《经筵讲义》《进故事》《通纪辑略》《味言发墨》《阳岩文集》。”^[16](P12655~12657)《宋史》卷437《真德秀传》也记载:“(真德秀)登庆元五年进士第,授南剑州判官。……所著《西山甲乙稿》《对越甲乙集》《经筵讲义》《端平庙议》《翰林词草四六》《献忠集》《江东救荒录》《清源杂志》《星沙集志》。”^[17](P12957~12965)明确记录其皆有《经筵讲义》传世。《全宋文》中收录有真德秀的《进读大学卷子》《讲筵卷子》“《大学》‘格物致知’章”、《讲筵卷子》“‘诚意’章”、《讲筵卷子》“《大学》‘致知’‘诚意’二章”、《讲筵卷子》“《大学》‘修身在正其身’章”、《讲筵卷子》“《大学》‘絮矩’章”、《讲筵卷子》“《大学》‘平天下’章”等。^[18](P280~296)刘克庄虽然没有直接以“经筵讲义”命名的作品传世,但存有《商书讲义》2篇,《论语讲义》2篇,《周礼讲义》1篇,都是给皇帝讲解儒家经典的文章。^[19](P110~146)经筵之文因其对象的特殊性,其语言古朴,文风庄重严肃,语气必须严谨恭敬,故文学性多不强,也很少有文章总集收录,惟有《南宋文范》有少量收录。另外还有语录体著作,在南宋后期颇为流行,如宋末林希逸整理有《朱文公语录》一篇^[20](P252~253),但这类文章过于散漫,重道轻文,难入文学选家法眼,颇受当代和后世学者轻视。

宋季讲学之文更多的是关于道学义理相关论题的阐述,如真德秀《问答一》《问答二》诸篇,魏了翁的《问六经疑》《韩愈不及孟子论》等,林希逸散文中诸如《太玄》《周礼论》《文武之道大小如何论》《汉之为天数者如何论》等,都是典型的讲学文。这类文章议论风生,语言简洁明快,具有一定的艺术性,是宋季散文中学术价值较高的一类。

三、序跋类散文

这是笔者在研究中关注比较多,资料运用较频繁的一种散文文体类型。题跋是唐代产生的一种新文体,它原本是题写在包括文章、书籍、碑帖以及书画的开头或结尾,用以描述事件,发表议论的文字。这一文体在唐代尚不流行,比较有名的如中唐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叙》《送李愿归盘谷序》等,但至宋代却异军突起,成为文人讨论学术问题、考核历史事件、送别记人、抒发人生感慨等涉及生活各个领域的自由文体,是传统散文体裁的新开拓。为诗人或前辈大家的作品写序作跋,一般都是当时有一定社会地位、学术地位或文学影响力的德高望重人物,如真

德秀、魏了翁等都是宋季道学界的领袖人物,又曾经担任朝廷要职,其弟子,或友人,或慕名者,多会选择通过真、魏这样的当世大儒为自己诗文或其他作品题写序跋,以抬高自己的地位,扩大自己的影响,故此,真德秀、魏了翁文集中序跋类的作品特别多。笔者据《全宋诗》统计,魏了翁有各种序(跋、题)235篇;真德秀则有各种序(跋、题、后记、后跋)189篇,占据其散文相当大的比重。而刘克庄作为宋末的一代文宗,其地位决定了不管谁的作品,一经他品题,可以立竿见影身价倍涨;加上他自己于创作又有特别的兴趣和爱好,面对求题写的亲朋好友或晚辈后学几乎来之不拒,因此他也成为南宋后期创作最丰厚的作家,其序跋等类型的散文自然也最多,各种序(跋、题、赠、后语、后叙)多达502篇,且有的一篇里边包含数章,如《跋吴帅卿杂着》包含有“恕斋记”“恕斋诗存稿”“恕斋平心录”“恕斋读易诗”和“恕斋讲义”。而叶适、袁燮、黄榦、包恢、林希逸等以及其他宋季文人的文集中也保存有数量不等的题跋类文章,洋洋大观,成为宋季散文中堪与其他阶段题跋文相媲美的一种文类,有相当的诗学价值,很多观念为后代学者所借鉴。

关于宋代题跋类文体的关注和研究,比较有影响的是明末清初的毛晋的《汲古阁书跋》,其中对宋季理学家的此类文章给予了很高评价,如《西山题跋》赞扬真德秀“题跋虽无坡公之风韵,却如三公衮衣象笏,拱立玉墀之上,其岩岩气象,可令寒乞小儒望之神懼”;《魏公题跋》则称魏了翁题跋“无论严君子小人之辨,衮钺凜然,即偶载一句一物,如《黎莫椰子酒》《橄榄诗》之类,亦寓表廉训俭之怀”。^[21]可见题跋这类丛脞芜杂的小文短制,在两宋是颇受文人欢迎的,也成为宋季文人言理纪事、抒发情志的重要载体。题跋类散文大多数比较短小,但相对于其他类型的散文,它更能体现出撰写者个人思想情感与艺术趣味。而宋季道学家尤其是程朱正宗派学者始终念念不忘天道义理,故在创作题跋文时也时刻将耳目所见与道德义理联系到一起,这甚至成为宋季理学学者的一种写作模式,如真德秀《题全氏步云斋》《跋东坡书〈归去来辞〉》便是如此。这类作品或许会让人产生一种陈腐乏味的感觉,但是仔细欣赏也能感受其典雅清丽一面,甚至也令人有比较悠长的回味。

四、记体类散文

记体文是一种历史比较悠久、类别比较复杂的

散文文体。关于它的渊源,明代学者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中有所追溯:“《禹贡》《顾命》乃‘记’之祖。而‘记’之名,则仿于《戴记》《学记》诸篇。厥后扬雄作《蜀记》,而《文选》不列其类,刘勰不著其说,则知汉魏以前作者甚少,其盛自唐始也。”^{[22](P145)}说明记体文起源较早。这一散文文体最初以记事为主,发展到唐代开始逐渐加入了一些议论因素,而到宋代,记体文中记的成分减弱,议论的成分越来越多,宋季道学家的记体文更是将议论发挥到极致,呈现出以论为记的特点。关于它的类别,褚斌杰先生《中国古代文体概论》中通过对古人相关论分类观点的归纳整理,将“记”文体划分四大类,即台阁名胜记、山水游记、书画杂物和人事杂记。^[23]宋季记体类散文主要包括亭台斋室记、学记和山水游记等。从数量上看,亭台记数量最多,而学记数量最少,但学记却是这一时期最具理学色彩的散文,是道学家传播自己学术理念,宣扬教育思想的重要载体。

学记是记体类散文的一种,是为地方兴建学校所做的记,主要记录学校地理位置、兴建过程、建成情况、作者的教育思想等。据统计,南宋学记文共计285篇,而宋宁宗朝至南宋灭亡这一阶段现存160篇。^[24]保守估计,宋季学记占据南宋学记文的半壁江山,尤其是理宗朝学记文创作进入鼎盛阶段,道学家成为这一文体昌盛的主力。

理学作家群的创作是学记文兴盛的重要原因。由于受理学先辈尤其是朱熹大兴学校,注重教育的影响,宋季道学家一方面继续创办各级官办学校和官私书院,另一方面也通过学记创作传播教育理念,扩大学校影响。因此,宋季许多集学问家、教育家于一身的道学官员,对学记的创作兴趣非常浓厚。如叶适就创作过《汉阳军新修学记》《六安县新学记》《金坛县重建学记》《瑞安县重修县学记》《温州新修学记》《信州重修学记》《长溪修学记》《宜兴县修学记》《石洞书院记》等学记作品,魏了翁也有《泸州重修学记》《华亭县重修学记》《常熟县重修学记》《靖州鹤山书院记》《夔州重建州学记》《黔阳县学记》《道州建濂溪书院记》《通泉县重修学记》等,真德秀有《铅山县修学记》《政和县修学记》《建宁府重修学记》《龙山书院记》等,刘克庄有《云泉精舍记》《澧州重建州学记》《汀州重修学记》《泉山书院记》等。其他作家的学记兹不一一列举。宋季学者纷纷利用学记宣扬道学思想,与其他时期的学记相比,宋季学记文体现出明显的彰显道统,确立理学在儒家统绪正统地位的特征,以及研习洛闽之学的思想倾向。

从数量上看,宋季作家的亭台斋室记要远远多于学记,其题材之丰富,内容之复杂,亦非其所能比。其中值得重视的是,他们创作出相当数量宣扬道学人物的祠堂记,如魏了翁的《徂徕石先生祠堂记》《长沙县四先生祠堂记》《长宁军六先生祠堂记》《宝庆府濂溪周元公先生祠堂记》等,真德秀的《明道先生书堂记》《昌黎濂溪二先生祠记》《东莱大愚二先生祠记》《南雄州学四先生祠记》等,刘克庄的《修复艾轩祠田记》《城山三先生祠记》《宴云寺玉阳先生韩公祠堂记》等,都是通过对当地道学先驱或大儒的纪念,建立道学统绪,阐扬儒学精神。

宋季山水游记数量不少,但名篇无多,与此前作家相比黯然逊色,且说教气息更浓。

总体而言,宋季记体类散文具有崇尚理学,借记阐理鸣道,重道而轻文的倾向,在理学官方化的背景下,不可避免地会表现出浓郁的道学色彩。

五、笺表奏疏类散文

宋季学者尤其是道学派文人士大夫留下了大量笺表奏疏,就道学派的此类作品来看,其主要内容是与教化、个人修养、时事政治密切相关的主要问题。以真德秀等为例,其作品就主要是宣扬儒家传统文化,倡导正心诚意的个人修养和针对社会问题发表自己看法等,具有积极用世,与社会现实结合较为紧密的特点。

作为真德秀数十年作为文臣生涯的记载,他现存文集51卷,奏议诏敕类文章达22卷之多,占整个文集的百分之四十以上。关于真德秀的奏疏文,据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二“文章有体”条记载,杨长儒(号东山,杨万里长子)虽然批评包括真德秀在内的南宋文人碑铭等文“只是词科程文手段,终乏古意”,但同时也称赞真德秀“长于作奏疏”。^{[25](P265)}通过频繁上奏疏,真德秀向皇帝直言进谏,提出自己关于国计民生的多方面建议,其人其文都颇得时人敬重。其作品或阐扬性理,弘扬教化,或直言时事,揭露社会问题,或论学议文,皆能做到修辞立诚,平实详尽,词平理畅。他的同乡后辈著名作家王迈在为《真西山集》所作后序中,对其奏疏文引起的强烈反响做了精彩描绘:“先生壮年游蓬山,直鳌岭,立螭坳,每上一谏疏,草一制诰,朝士大夫与都人士争相传写。出而驾使轺,暨开大藩府,凡囊封驿奏之达于上,若庭谕壁戒之布于下者,侵梓一出,深山长谷,穷阎委巷之氓,乌蛮象郡、风帆浪舶之贾,竞售之如获至宝。”^{[26](P319)}其弟子刘克庄在其所撰《西山真文忠

公行状》中亦云:“公少以文词独行中朝,所草大诏令温厚尔雅,尤为楼公钥赏重。立螭之后,言议出处动关世道,谏书传四夷,名节暴当世。”^{[27](P419)}如其任岁迁太学博士所作《戊辰四月上殿奏札一》堪称他奏议中的佳作,满腔爱国为民之情和坚定不移之心通过诚恳的语气和朴实无华的语言表现出来。魏了翁“诚积而气和,辞平而理畅”的评价堪称准确。

宋季其他人的笺表奏疏类散文也各有特点,如魏了翁的奏疏颇受称赞,罗大经《鹤林玉露》在评论真德秀“长于作奏疏”的同时,又说“魏华甫奏疏亦佳”。郭预衡《中国散文史》认为“魏了翁的文章,在南宋道学家中,也是较有生气的”,并举其上章论奏之《论士大夫风俗》《论敷求硕儒开阐正学》《乙未秋七月特班奏事》等文,认为其所论皆是当世急务,针对性很强。^{[28](P662~664)}

除以上所举数种类别,宋季还有大量的政论文、书信体文、碑志文、墓志铭文、行状等。其数量虽然巨大,偶尔也有一些堪称惊艳的作品出现,如叶适的碑志文成就相对较高,《四库全书总目》赞“其碑版之作,简质厚重,尤可追配作者”^{[29](P1381)};真德秀《跋著作正字二刘公志铭》中云:“永嘉叶公之文于近世为最,铭墓之作于他文又为最。”^{[30](P211)}钱基博先生也说“篇有余态,事可可信”^{[31](P649)}。另外,宋末文天祥、谢枋得等殉国志士之文,林希逸、郑思肖、谢翱等遗民之文也产生过较大影响;但因其总体看来成就不高,影响不大,故在此不一一赘述。

通过以上的简略分析大致可以看出,宋季散文从作家队伍来看,道学家以及受道学影响的作家占据文坛主导位置;从作品所表达的思想来看,宣扬道德伦理,阐扬天理性命,教化民众,关注现实的经世致用思想占据上风;从散文体裁看,实用性文体运用最多,而抒情性散文难得一见;从散文艺术上看,与前人相比,议论成分显著增多,叙事成分明显减弱,体现出鲜明的文以载道的特点,语言平实,朴素自然。宋季理学家的散文代表了这一历史阶段散文的最高成就,在两宋散文史上占据着无法替代的重要地位。透过它,可以一定程度了解政治和学术权力是如何影响和规范文学的历史进程和发展方向的。

参考文献:

- [1]王若虚.文辨[A].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90册)[C].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2]王水照.宋代文学通论[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
- [3]陆游.陈长翁文集序[A].全宋文(第222册)[C].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4]罗大经.鹤林玉露[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5]袁桷.曹伯明文集序[A].文渊阁四库全书本[C].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6]袁桷.戴表元墓志铭[A].文渊阁四库全书本[C].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7]虞集.道学园古录提要[A].四库全书总目[C].北京:中华书局,1965.
- [8]刘辰翁.须溪集提要[A].四库全书总目[C].北京:中华书局,1965.
- [9]何良俊.四友斋丛说[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10]周密.癸辛杂识·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8.
- [11]虞集.序庐陵刘桂隐存稿序[A].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07册)[C].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12]朱迎平.宋文发展整体观及南宋散文评价[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1(1).
- [13]陈军.南宋闽学家散文研究[D].广州:华南师范大学,2007.
- [14]陈善.扞虱新话[A].文渊阁四库全书本[C].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15]吴渊.鹤山集序[A].全宋文(第334册)[C].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16]脱脱,等.宋史(第36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7]脱脱,等.宋史(第37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8]全宋文(第313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19]全宋文(第330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20]全宋文(第335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21]毛晋.汲古阁书跋[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
- [22]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 [23]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 [24]张鑫.南宋学记文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16.
- [25]罗大经.鹤林玉露[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26]王迈.真西山集后序[A].全宋文(第324册)[C].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27]全宋文(第330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28]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中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 [29]永瑤,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30]全宋文(第313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31]钱基博.中国文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3.

责任编辑 韩玺吾 E-mail:shekeban@163.com